

# 中國外交政策與足球發展之關係

##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eign Policy And Its Relation In Soccer Development

陳彥君 遠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 摘 要

中國男子足球發展的歷史，在短短的半世紀中可以分成三個階段。首先是迅速起步期（1949～1960）：在這個時期因為政府銳意求進，從培育、代訓、建制幾方面樹立了正確的體育政策，包括從基層足球發展起、開創各項相關制度、熱心國際足球交流，送選手到匈牙利受訓成為國手，短短十年從零到戰勝匈牙利二軍球隊，算是交出了第一張成績單。

但第二個階段是嚴重中挫期（1961～1976），這是長達十五年的傷害期，外交上中國退出國際足總，使熱絡的國際足球交流大幅縮水。內政上大躍進造成飢荒、十年文革破壞所有足球發展所需的人事物。要到1977年才脫離苦海、邁入第三階段：重新開始，往職業化邁進。七零年代中國外交政策轉而開放，連帶使得足球的國際交流頻繁。鄧小平改革開放後更促使足球朝協會制以及俱樂部方向發展。職業化確實提高了中國足球的水準，讓中國終於在2001年進入世界盃，初步達到半世紀前設定的目標。

兩岸雖常處在競爭狀態，然而回顧半世紀來的發展，兩岸在足球上的成績早已是高下立見。不論台灣相較大陸是否地小人少、資源不足等等先天的弱勢，在後天努力上，政府與民間的關注與投入，才是成敗的關鍵。

**關鍵詞：**中國外交、足球發展

Yen-Chun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 of Leisure and Sport Management, Far East University

### **Abstract**

Sports were not always of pure competition activity, not only liking the nationalism and the patriotism, the sports competition may transform as a stimulation for nationality emotion, causing the audience to weave "the imaginative community". Therefore sports and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are closed. Especially the soccer has swept away the five continents, being most watched ball games competition, in Taiwan actually are not interested in soccer, to have never realized the close correlation of soccer and the Chinese near contemporary history, especially in 1949 after both independence, soccer international membership has become the war in which either both competed; Standing in both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diplomatic viewpoint, the soccer is a issue quite worth to discuss.

This article after introduction would discuss whe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 founded a nation for about a half century of diplomatic development, because this big environment controlled the future in the mainland's soccer development. Was afterwards by the male soccer, discuss the mainland's soccer development, and took all previous years result as the evidence.

Although both lands often had the war condition, but still in time could take the learning from others, urging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interested in Taiwan's soccer development question, heading to great strides toward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Key wor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occer development

## 一、緒論

###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體育項目從來不是單純的比賽活動而已；誠如史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言，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公、私領域之間，還可藉著體育競賽加以連結；甚至體育競賽可以轉變成激發民族情感的重要媒介，至少對很多男人是如此。<sup>1</sup>因為體育競賽容易讓人產生與有榮焉之感，尤其眼見著年輕而優秀的運動員，在足球場上表現出令人夢寐以求的成績的時候，會讓支持者跟著驕傲起來，而編織起「想像的共同體」，這種想像與場上的十一人所組成的隊伍一樣真實。<sup>2</sup>因是之故，體育與政治的關係永遠是緊密不分的。尤其足球是橫掃五大洲、觀看人數最多的球類競賽，台灣一度宣示要足球年，但卻只是三分鐘熱度，熱潮過後官民皆漠然以待，無法持續發展，也無心矯正目前的男足、女足進展上的問題，只是放任台灣漸成足球沙漠。

然而如果考究歷史，會發現其實足球與中國近現代史緊密相關，簡直可以說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縮影。不管是清末隨著外力進入的歷史，或者1949年兩岸分治之後，足球國際會籍成為另一個兩岸較勁的戰局，連兩岸的男足、女足發展歷程，在時間上都形成了對比。從1949到2000年這半個世紀兩岸的足球發展，不管是站在足球發展史的立場，或者從兩岸競爭的國際外交觀點，都是相當值得探討的問題。

<sup>1</sup> 參閱《民族與民族主義》，霍布斯邦著，李金梅譯，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頁192~193。

<sup>2</sup> 此乃左派史家 Benedict R. O' Gorman Anderson 的著作《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出版社，1999。

而選擇中國足球作為討論個案，是因為中國的足球發展尤其能夠突顯政治與體育之間的關係。中國在激情中建國，外交政策完全可以看出民族情感與國際性的雙重影響。在外交政策從封閉走向保守的過程中，足球也隨之有所改變，可以說外交政策不斷牽引著足球的可能走向，所以如果想看政治力量如何影響到體育，中國的外交政策與足球之發展，可謂是最好的討論個案。

### (二)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文以1949中國建國到2000年為主，1949年兩岸分治，因為體育競技常不在場內，場外的風雲詭譎才令人側目，尤其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分裂成兩大意識型態集團，只是忌憚於核彈威力形成冷戰，間或有代理戰爭、區域性戰事點綴期間。兩岸的問題和南北韓、東西德一樣，都是冷戰架構下的產物，因此在討論足球發展之前，應先瞭解中國在這半個世紀不同的內政與外交發展，尤其是外交政策影響及向外取經的方向，左右了足球發展的成敗高低。但是受限於篇幅以及第一手資料取得的可能，本文若干論點建立在學者的研究基礎之上，尤其是關於中國黨史的部份。

### (三)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資料來源，在於前輩學者之相關研究。研究方法上，採取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將所蒐集到的材料，一一加以歸納整理，做出排序、擷取關鍵之變化。以瞭解史實之真相，以及其承先啓後等重要影響。

## 二、中國外交關係發展概述

中國的建國，帶有濃厚的民族狂熱，不過共產思想來自蘇聯共產國際的擴散，中國的茁壯，也與蘇聯扶持有關，因此本身又帶有國際性。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雙重且深刻地影響

了內政與外交方向。

中國的外交關係一直纏繞著蘇聯，所有的外交政策都會因為與蘇聯關係而有所變動。因此早在國共內戰時期，美國的調停並不能改變毛澤東對美國是帝國主義者的成見。1949年中國建國，不顧美國杜魯門總統的示好，宣布以俄為師，外交政策「對蘇一面倒」。

次年韓戰爆發，中國在蘇聯拒絕空軍支援的情形下，依然甘為馬前卒，不計代價支援北韓，竭盡國力犧牲，終於將美國逼往談判桌。這場勝利對中國影響相當重大：首先它終於消除了史達林對毛澤東的疑慮，開始提供大量技術、人才協助中國工業化，並為中國培訓技術人員，後來這兩萬多名技術官僚，甚至在鄧、江時期成為領導階層。而且在未來十餘年的外交路線上，親蘇仇美原則大致確立，與美國在台灣、越南問題上不斷針鋒相對。其次，中國贏得第三世界國家的尊敬，在1954與印度的邊境會談，以及同年參加日內瓦和平會議，商討法軍退出中南半島、緩和中南半島緊張局勢這兩個議案上，都算是外交的突破，也使得1955年周恩來去印尼萬隆參加亞非會議時，能得到許多友善回應，打破了建國以來封閉、孤立的外交情境。第三，中國自清末鴉片戰爭（1840）以來一路敗退，這次中國能以落後的裝備逼和美軍，對於長期低落的民族自尊而言是一大救贖。因此當中國喊出「抗美援朝」口號時，對於國內正在進行的三反、五反、反右派、均分土地等各項運動，都能夠在民族主義的激情下被合理化，支持國家在「國難當前」時的各項措施，於是中國用此機會，切斷了民間與歐美的往來，強迫外資撤出、教會本土化，將所有可能的反側都清除，使得政權穩若磐石。最後，又以戰爭需求為名，配合已經深植的社會控制

力，將財政稅收掌控度高達總產值的24~30%。可以說拜韓戰所賜，安內與攘外的目的都達到了。

但是與蘇聯的友好關係，在1956赫魯雪夫開始清算史達林之後，逐漸出現裂縫。1957毛澤東訪問莫斯科，瞭解赫魯雪夫對西方的和平競爭態度後，表達強烈的不滿，因此在不久後推出的大躍進，其超英趕美的口號便有挑戰蘇聯權威的暗示，赫魯雪夫自然對這造成三年人為飢荒的政策大加嘲諷抨擊，也對1958八二三砲戰所引發的台海危機、美蘇緊張感到不滿。1960、1961年中蘇之間的衝突終至檯面化，即使1964年蘇聯政變更換領導人，也已無力修復雙方的關係，尤其1964年中國試爆核彈成功，成為核武俱樂部一員後更有恃無恐，與蘇聯邊境皆屯重兵。但是如此一來，中國在共產國家中成為異端，又因邊界問題與印度、政治問題與印尼關係惡化，外交關係在1960年代後期急速惡化。1966年開始文革的激情，讓蘇聯疑慮義和團式的瘋狂民族情緒再現，終於引發1969年中蘇珍寶島小型武裝衝突，這也讓毛澤東改弦易轍，引美制蘇，利用乒乓外交穿針引線，在1971年取得聯合國席次，1972年與日本建交，美國尼克森訪問北京，發表一個中國原則，定位兩岸為內政問題。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交方針急轉彎後收穫豐富，而中華民國的外交則自此落入下風。

中國外交的風光，在1989年天安門事變後一度落入谷底。原本那應該是有外交重要進展的一年，因為五月份，戈巴契夫訪華，這是中蘇分裂之後第一個訪問北京的蘇聯總書記，也是修補中蘇關係的重要契機。但是六四天安門的爆發，卻使全世界譴責中國，歐美並進行政治抵制、經濟制裁、企業撤資。不過鄧小平的外交原則是敦睦鄰邦，強調

和平的外交環境，因此在 1990 年全球經濟不景氣、中國卻以廉價成本吸引各國重新與中國有密切往來；除了外資之外，等於爭取到進入以歐、美、日為主的國際社會。也因為六四天安門的發生，使中國當時的領導人們國際形象大惡，遂給予了江澤民接班的機會。因此江澤民意外出線，在外交政策上自然延續鄧的外交佈局，大力推動「大國外交」，極力加強對世界有影響力之大國往來關係，並積極發揮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胡錦濤（2003）也秉持這項原則，喊出「和平崛起」口號，亟於消除各國對中國的戒心，例如在討論北韓問題的六邊會談上，美日皆須仰賴中國向北韓溝通，便是近來最好的例子。<sup>3</sup>

綜觀中國自 1949 建國以來，從對蘇一面倒，後來與蘇聯交惡，轉向對歐美開放，並用廉價的勞工吸引外資前來。當 2000 年逢世紀之交時，江澤民的大國外交已經頗有成效。短短半世紀，雖然外

交方針大逆轉，但是足球的發展，卻牢牢相隨。

### 三、迅速起步階段：從 1949~1960

需要先討論中國建國以來的外交發展，是因為中國是個政治性撲天蓋地的國家，所有事務都籠罩在政治需求之下，足球的發展當然也跟內政外交環環相扣。尤其中國建國之初，內政外交皆未穩固，人心惶惶，國際地位妾身未明，兩個中國可能繼續內戰的問題，在冷戰架構下極受國際矚目。而足球運動可說是國際性運動，一向受到歐美人士的喜愛；因此中國以參加國際性的足球比賽，並取得優勝成績，作為提振奮民族自信心、激勵愛國精神和提高中國大陸在國際上地位的方法。因此相較於其他球類的發展起始點，與受關注的程度落差，可以推論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甫建國便將能見度最高的足球視為重點發展球類，而且不只是單純的體育運動而已。

體育運動想要有成，一則是從學校教育著手培訓，一方面則是橫向移植，不管是向外借將或者汲取經驗、成功者技術，而且還要建立健全的比賽等體育制度以永續經營。這幾件事情本應同時進行，因此 1951 年 12 月 1 日~9 日，中國在天津民園體育場舉行了第一屆全國足球錦標賽。共有八支足球代表隊參加比賽，分別是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六大行政區和解放軍、鐵路系統，由東北隊和華北隊分獲冠亞軍。這八支的足球隊大多沒有經過正規的集訓，也沒有專職的教練，普遍技術較差、體力不足的弱點。但是經過這次比賽，中國方得以在這批球員中篩選出卅位表現優秀者，組成了國家足球集訓隊，成為中國建國初期足球運動的主要原動力。同年，政府第一次派出足球隊（人民解放軍足球隊）出訪捷克和

<sup>3</sup> 關於中國外交關係、中蘇關係的變化，可參閱陳永發，〈抗美援朝與政權的鞏固——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中蘇分裂：反修正主義〉、〈民族主義、國際主義和階級鬥爭〉《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台北：聯經出版社，2004 年 5 月二版，頁 543-578、758-769、998-1011。（日）中嶋嶺雄，〈外交關係：從朝鮮戰爭到萬隆路線〉、（美）艾倫·S·惠廷〈中蘇分裂〉、（美）托馬斯·魯賓遜，〈中蘇對抗：中國北部標建地區的戰爭與外交〉、（美）喬納森·波拉克，〈對美開放〉、（美）R. 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 237~266、442-496、241-299、407-473。

保加利亞。這支擁有多名國手級球員的代表隊，竟以 1：17 和 1：9 的懸殊比分分別輸給了捷克和保加利亞足球隊。足以證明當時中國大陸足球與世界水準差距之懸殊。<sup>4</sup>

1952 年，韓戰的局面已經呈現僵持，雙方都已有無法用武力徹底壓倒對方的認知，加以當年度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所舉辦的第十五屆奧運，是蘇聯在 1917 共產革命之後第一次重返奧運，<sup>5</sup>在奧運場上蘇聯表現不俗，而且同屬共產國家的匈牙利勇奪足球項目冠軍。而儘管當時中國尚未取得國際奧會的正式會籍，但是因為中國與芬蘭有邦交，因此芬蘭片面告知有正

---

<sup>4</sup> 中國足球協會編，〈新中國的足球運動〉，《中國足球運動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3 年，頁 115。

<sup>5</sup> 1912 年在斯德哥爾摩的第五屆奧運，是帝俄所參加的最後一次奧運。1917 年列寧發動十月革命之後，向各地輸出共產思想，利用兩次大戰的機會，在東歐與中國、北韓等地建立共產政權，使得世界分裂成兩大意識型態衝突的集團。在蘇聯的認知當中，奧運是屬於資產階級的活動，不願意加入，所以在 1920~1945 年之間，蘇聯曾經企圖另組一個國際共產集團運動會，與原有之奧運會抗衡，但是顯然不成功。1948 年東歐諸國相繼回到倫敦奧運會場，蘇聯遂改變想法，將奧運視為一個舞台，向資本主義國家展現其優越的運動實力，也是在展現共產主義的卓越。所以 1952 年蘇聯派出了多達 255 人的代表團，參加除了曲棍球以外的所有項目。也因為蘇聯重返奧運，奧運成為美蘇爭霸的另一個戰場。參閱湯銘新編譯，〈第十五屆奧運會〉，《奧運百週年發展史》，台北：中華臺北奧林匹克委員會，民國 85 年，頁 281-282。

式會籍的台灣不要參加奧運，反而發邀請函給中國。此舉自然引發爭議，因此中國雖然派遣足球隊參加，但未能準時到賽，僅與芬蘭進行了比賽，以 0：4 負給了芬蘭隊。<sup>6</sup>

1953 年起，中國也開始培育足球種子。2 月在上海舉行了第二屆全國足球錦標賽，以及 13 個城市的青年足球錦標賽。參加比賽的 320 多名球員都在 20 歲以下。又在全國各體育學院先後都設置了足球普修課程班、專修課程班和足球專項課程班、足球進修班、足球函授班等。有的學院還設置了培養研究生的碩士班。每年都給全國各級學校、業餘學校、科學研究單位和各省市足球代表隊提供了大批優秀的教練師資。這對於發展足球運動和足球科學研究領域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時中國開始舉行每年一度的足球聯賽，從比賽制度去鼓勵足球運動的推廣。<sup>7</sup>

在 1954 年，中國於橫向移植的部分也得到很好的契機。前述 1952 年匈牙利是奧運足球冠軍；1953 年 11 月，又在英國倫敦溫布萊球場以 6：3 擊敗了英國隊（國家隊主場），打破了英國足球隊在本土保持了 90 年不敗的記錄，轟動了世界足壇！1954 年匈牙利又獲得第五屆世界盃亞軍；而且在這屆世界盃中，匈牙利共擊敗了西德、烏拉圭（上屆冠軍）、巴西（上屆亞軍）等世界強隊，後來在冠亞軍戰中，被德國隊復仇成功，屈居亞軍。儘管如此，世界足壇依然

---

<sup>6</sup> 中國足球協會編，〈新中國的足球運動〉，《中國足球運動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3 年，頁 123。

<sup>7</sup> 中國足球協會編，〈新中國的足球運動〉，《中國足球運動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3 年，頁 123。

公認 1954 年是匈牙利年。匈牙利是當時的世界足壇霸主，又同為共產國家，在毛澤東的親蘇心態上願意接受。所以 1954 年 4 月 1 日，中國派了一支青年隊赴匈牙利取經。這支隊伍共有 25 名球員：張俊秀、張宏根、年維泗、陳成達、方初秋、謝鴻鈞、朴萬福、王陸、張水浩、王克斌、崔曾石、成文寬、崔豪均、金昌吉、金仁傑、陳家亮、孫寶榮、王金豐、陳山虎、叢春余、孫無雲、張京天、朴曾哲、李元魁、曾雪麟，領隊是柯輪。同年 10 月，又增派 10 名球員赴匈牙利。匈牙利體委指派約瑟夫擔任教練，採用科學方法進行嚴格訓練。經過刻苦的訓練，曾幾次敗於匈牙利業餘隊的中國大陸國家足球隊，在半年後就打敗了匈牙利丙級隊，一年後戰勝了乙級強隊，實力已達到了匈牙利甲級弱隊之水準。1955 年 10 月，結束一年半的訓練學成歸國，政府繼續施以嚴格要求、訓練，而且這些球員也為以後提高中國大陸的足球運動水準，建立自己的國家足球隊，和強化足球教練水準，都有相當的影響。

1955 年，因為中國與蘇聯已經在韓戰期間簽訂許多互助條款，蘇聯願意代訓中國所需人才，因此中國聘請蘇聯足球專家，在北京體育學院培養出第一屆足球碩士班研究生，成為以後發展足球運動的教學、訓練、研究工作的第一代。

1956 年又聘請了匈牙利足球專家薩寶·帕爾(saibaupar)來華，舉辦兩期足球教練培訓班，每期學員為 70-80 人，幾乎全中國大陸所有的社會隊、青年隊的教練們都輪流來受訓。1956 年的足球發展還不止於此。當界奧運足球賽由蘇聯稱霸，更刺激中國決意建立甲乙級聯賽制度：將參賽隊伍按水準分為甲級隊和乙級隊，並規定升降級的辦法，為建立全國等級聯賽制

度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同時，還開始實行球員、裁判員等級證照制度，透過這些制度和措施的實行，增強足球的競爭性。次年，國家體委補充規定甲、乙級聯賽的辦法和時間，全國足球甲級隊、乙級隊聯賽逐漸走上規範化。從 1951 年首次舉行全國足球比賽，至 1956 年全國足球聯賽實行甲、乙級制度，標誌著中國大陸足球運動球隊體系初步確立，競賽水準和競賽組織管理水準逐步提高。此時參加甲級聯賽的有 12 支隊伍，全年的競賽分為兩個循環進行，第一循環在 3-6 月份進行，第二循環在 9-12 月份進行，已經有明確的賽季安排。但由於當時的經濟、交通條件的限制，還沒有實行主客場制。

1957 年 7 月，國際足總根據中國大陸足協提出的申請，核准 5 名中國大陸裁判員為國際級足球裁判員。整體來看，從 1949 年建國，到 1957 年不到十年的時間，中國展現了相當的決心，在移植技術、培育球員與教練、健全相關制度上，都有了初步的提升，這份成效，可以用 1957 年 1 月，第六屆世界盃亞洲、非洲區預選賽可以看出：首場比賽於印尼雅加達舉行，中國隊對抗印尼隊，由於中國隊缺乏參加國際正式比賽的經驗，以 0：2 負於印尼隊。第二場國家隊在北京主場迎戰印尼隊，以 4：3 險勝了對手。第三場比賽在緬甸仰光，國家隊和印尼隊激戰 120 分鐘不分勝負，以 0：0 的比分持續到終場。最後，由於印尼隊的淨勝球多中國大陸隊一球，而使中國大陸隊痛失第六屆世界盃亞洲第一組的出線權。近十年的積極提升，依然被擋在國際級正式大賽的場外，中國大陸足球從那個時候就開始嘗到打入世界盃的艱辛與苦澀。

儘管倍感艱辛，但是也從比賽中獲得了經驗，對實力提升是有正面助益的。依照中國如此積極的

求進，中國足球水準應該扶搖直上，政府也繼續熱烈關注足球，1958年第六屆世界盃後，還邀請蘇聯教練索洛夫約夫(sorlofujorfu)到中國大陸擔任教練工作，除了代為訓練青年球員外，並再於重慶舉辦教練訓練班。國內也舉辦了全國比賽，還有球員評選活動，甚至居然以1:0打敗了來訪的瑞典冠軍球隊，連國際足壇都轟動了。緊接著1959年，中國為了慶祝建國十週年，在北京舉辦了中、蘇、匈三國足球賽，中國隊以當年到匈牙利受訓的球員組隊，雖然1:0輸給蘇聯國家隊，但也以1:0戰勝匈牙利國家二隊，展現了學習成效。1960年越南又在河內舉辦中國、北韓、越南、蒙古四國足球賽，中國三戰三勝取得冠軍盃，形成中國建國以來的第一次足球運動高潮。當時有條件推展足球的省市都有了專業球隊，甚至二軍。在訓練上努力做到「技術全面、戰術多樣」，並樹立了中國大陸足球「勇、快、巧、準」和大運動量訓練的獨特風格，足球水準往上提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整個足球發展欣欣向榮，充滿希望，但是危機卻已經潛伏在大環境中，也就是1958開始大躍進，所造成之三年飢荒。

#### 四、嚴重中挫時期：從1960~1976

大躍進造成長達三年的飢荒，嚴重影響了學生體質。據北京市1963年對9000名中小學生的調查，各年齡組男女學生平均體質都低於1959年。1963年5月召開的15省市群眾體育工作座談會，指出1962年高考生體檢完全合格的只占45.17%；學生參與體檢合格率也以達30%。<sup>8</sup>體質因素大大影響了足球運動的水準。更雪上加霜的是經濟困難，使得體育經費大量刪減，

<sup>8</sup> 全國體育學院教材委員會編，《體育史》，人民體育出版社，1989年，頁220。

無力承擔國內外正常的足球競賽，多數球隊中止了訓練，競賽活動，即使全國甲組隊聯賽保留下來了，但比賽場次減少了，競賽規模縮小。使初見成效的中國大陸足球發展遭受了嚴重的挫折。不只國內有嚴重狀況，1958年國際足總大會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中國再次要求排除我方會籍，依然遭到否決，中國乃宣布退出奧會、足總等八項運動總會，而且1960年後中國在外交上也與蘇聯交惡，整個對外關係陷入長時期的封閉，也因而對外界足球技戰術世界性的變化無法瞭解，所以在打法上沒有脫離50年代中期從匈牙利足球取經所學到的那些東西，沒有太多的創意。比起國際間在60年代足球的快速發展，中國大陸的足球停滯不前，明顯的落後於世界強國之後了。

大躍進雖然在1961年喊停，但是傷害不可能立刻恢復，所以中國能夠重回國際足球場，已經是1963年11月在雅加達舉行的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足球比賽，這也是中國隊繼首次兵敗世界盃後，第二次參加正式國際大賽。在比賽中，中國大陸隊勝馬里隊、平印尼隊，獲小組第一，但在半準決賽中以1:2負於烏拉圭隊，未能更進一步。

1964年2月27日至3月21日，中國中央召開了全國足球工作會議，共多達141人參加。這次會議總結了中國建國以來的經驗，並向全國發出「大力發展足球運動，迅速提高技術水準」的決定。對於廣泛推展足球運動，加強青少年的訓練工作，加強足球運動的領導等方面，都提出了改進的要求和措施，包括足協改進了全國甲、乙級全國循環升降機制，並確定了全國發展足球運動的十個重點城市和地區：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武漢、旅大、瀋陽、南京、延邊和梅縣，對這些足球重鎮採取重點



政策。足球界也加以回應，明確的提出了將「從難、從嚴、從實戰需要出發進行訓練」的方針，之後的比賽證明，這個方針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當年巴西馬杜雷拉隊來訪，八一隊和天津隊都分別與之打成平局。次年中國重新組隊參加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終於取得第二名。就在中國大陸足球運動水準有所回升，並獲得一些成績，可能再次掀起一個新高潮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對足球運動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1966~1976 十年文革，訴求對所有既有體制大肆破壞，使得辛苦建立的足球教學、訓練、研究、競賽等工作幾乎全部停止，各種足球隊處於癱瘓狀態。有些球員甚至變成紅衛兵，在「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激情混亂下，體育界大批領導階層被打成造反派，許多幹部、教練和球員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叛徒、特務。最慘烈的，是 1969 年，熱烈支持足球發展的中國國家體委主任賀龍，被殘酷迫害致死。在文革期間，各體委的工作瀕於停頓，許多體育設施荒廢或被搗毀，體育報刊被迫停辦，體育院校停止招生，各種運動隊伍基本上解散，國際體育活動也基本上被取消。各省、自治縣、直轄市的足球代表隊解散了 47 個，有 124 名優秀足球運動員和 15 名專職足球教練離開了球場，致使中國大陸足球運動水準在文化大革命結束時，遠遠落後世界強國。連青少年球員也深受影響，1973、1974 年，北京、天津、瀋陽對當地近萬名中小學生體檢，發現其肺活量、心血管運動功能的指標都低於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水準，加上業餘訓練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導致球隊面臨青黃不接的窘境。<sup>9</sup>

<sup>9</sup> 全國體育學院教材委員會編：《體育史》，人民體育出版社，1989 年版，頁 222-224。

## 五、重新開始，往職業化邁進：從 1977 迄今

文革在 1976 年結束，此後政治局勢漸趨於穩定，經濟狀況逐步好轉，足球也重獲生機，對於在文革中遭到傷害的部分，中國中央開始致力補救。1977 年，中國國務院批准了國家體委《國家體委關於提高我國足球技術水平若干措施的請示報告》，國家體委得以召開全國足球工作會議決議不僅重建、還要在提升文革前的足球所有制度、水準，並且對針對青黃不接的困窘，決議大力發展青少年足球運動。

工作目標確立後，中國足協即於 1978 年恢復了全國甲乙組隊比賽雙循環升降賽機制，並建立了全國成年、青年的各組競賽制度。鞏固了 1957 年形成的甲——乙——青——少四組競賽體制，第一次制定了三年不變的競賽計畫，實行了以甲、乙、丙三組升降組制度。甲乙組隊的聯賽場次，刷新了中國建國以來的最高水準。

1979 年，爲了落實 1977 年全國足球會報的發展青少年足球決議，中國足協增設了 16 個重點地區：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瀋陽、旅順、大連、延邊、重慶、武漢、青島、南京、長春、昆明、西安、石家莊，爲這 16 個地點舉辦基層小學生萌芽盃比賽、中學生希望盃比賽，以及 16 城市青年冠軍賽，使青少年足球水準大幅提高。1982 年在新德里舉行的第 9 屆亞洲運動會上，青年足球隊獲得亞洲第二名的佳績，並獲得參加次年在墨西哥舉行的世界青年足球錦標賽的資格。中國大陸青少年足球的蓬勃發展，也引起了國際足總的重視。1983 年 9 月，國際足總主席夏維蘭治在觀摩了中國大陸第 4 屆全運會後，委託中國大陸舉辦了首屆「國

際足總十六歲以下柯達杯世界足球錦標賽」。柯達杯決賽於 1985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11 日，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大連舉行，共有 16 隊參加。中國大陸隊在分組賽中以第一名的資格進入 8 強，但是在半準決賽中以 2：4 負於德國隊。

另外，1970 年代前期，中國雖然陷入文革漩渦，但也是中國開始向外界主動表示友好、開拓外交的時期，而且此時中國、美國同時調整彼此外交政策，往來漸趨頻繁，1971 年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1972 年日本與中國建交，1978 年美國正式與中國建交。加上文革期間足球因為對外封閉而落後，因此文革結束後，中國國家體委極力促使足球的國際交流重顯熱絡。1977 年 9 月 15 日至 21 日，美國宇宙隊就先後訪問了北京和上海。這支球隊擁有一代球王比利、足球皇帝貝根鮑爾等世界級足球巨星，為經驗缺乏的中國大陸隊提供了難得的學習機會。同年 10 月 2 日，中國大陸隊回訪了美國，這是繼中國大陸乒乓球隊首次訪問美國之後，第二支到美國進行交流的國家級球隊。次年，義大利甲級隊國際米蘭隊訪華，沒有要求任何出場費，在北京和杭州與國家隊比賽兩場，均以 1：1 戰平。此後，先後在北京、廣州舉辦了三次國際足球邀請賽。

1978 年，台灣被國際足總和大洋洲足協暫停會籍，次年 10 月中國取得正式會籍，使得中國參加國際比賽的性質，由原來較多的友誼賽逐漸向正式比賽。不過長時間的落後，使大陸隊在國際比賽中連嚐敗績。例如 1980 年第二十二屆奧運會足球會外賽，大陸隊在小組賽中就輸給了新加坡隊。同年 9 月，在總教練蘇永舜的帶領下遠征科威特，參加第七屆亞洲杯賽，但在小組賽中也未能出線。1981 年第 12 屆世界足球杯賽預賽，大陸隊以全勝的成績獲亞太區

預賽第 4 組的第一名，但一樣在之後的比賽中慘遭滑鐵盧，痛失出線權。1983 年第 23 屆奧運會會外賽，重新組成的大陸國家代表隊一樣未能出線。1985 年再一次參加世界盃，依然再次飲恨，大陸球迷的失望甚至釀成了暴動。1987 年，第 24 屆奧運會足球預選賽在亞洲分為東、西兩大賽區進行，中國隊表現出色，使大陸球隊第一次得以晉身國際大賽決賽圈賽事。1988 年，大陸奧運足球隊在漢城奧運會上，終於可以首次亮相於國際舞臺上。但是 1989 年，中國大陸隊三征世界盃，在預賽中淘汰了當時的亞洲強隊伊朗隊，晉級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區決賽，但依然無以為繼，又一次與世界盃失之交臂。虛擲了十年的空白，以及加諸的傷害，讓中國需要花更多的時間，才能達到本應達到的水準。

大環境在鄧小平於 1981 年掌權後，已經逐步往改革開放方向前進。隨著中國大陸國家經濟體制逐漸轉向市場經濟，市場化的進程也影響到足球運動事業的改革和發展。1985 年，中國國家體委成立了足球辦公室，形成了掌管全國足球訓練、競賽、外事等為一體的綜合體制，獲得了一定成效，並慎重地向協會制和俱樂部制過渡。

1990 年 2 月，中國國家體委發出了《關於中國足協實體化的通知》，撤銷足球辦公室。1992 年 6 月，國家體委在北京紅山口召開全國足球工作會議，被認為是中國現代足球改革的重大起點；會議中做成幾項決議：將中國大陸足協實質化，使其既是中國大陸全國體育總會的會員，又是中國國家體委的直屬單位，成為全國唯一領導足球的權威性機構，管理一切與中國大陸有關的國際足球活動，原來所有行政部門的職權全部歸於足協，足協下設辦公室、技術

部、競賽部、外事部、國家隊。會議還決定，到 1993 年底之前，北京、上海、天津、大連、廣州、青島、武漢、重慶、西安、深圳、瀋陽 11 個城市的足協首先實現實體化。在決議中也清楚表示，建立和完善足球俱樂部體制，是中國大陸體制改革的根本性措施，要求於 1993 年底，上述的 11 個足球重點城市建立足球俱樂部體制，並逐步實行俱樂部賽制，推動足球的職業化進程。

1991 年，中國大陸足壇採取了一個新的舉措，競選產生國家隊總教練，結果原國家二隊總教練徐根寶在未遇到強烈競爭對手的情況下當選，並兼任奧運隊總教練。年底，徐根寶率奧運隊赴吉隆坡參加奧運會外賽之亞洲六強戰，曾立過「橫下一條心，一定要出線」的軍令狀，但結果未能如願，使徐根寶國家隊總教練的地位岌岌可危，也徹底摧毀了人們對中國大陸教練的期望。所以在 1993 年，中國足協從德國請來了曼海姆隊教練施拉普納（selapuna）擔任中國大陸國家隊教練，在洋教練的率領下，同一年即奪得第十屆亞洲杯季軍，燃起了中國大陸球迷的希望，使其聲譽上漲，甚至被當作神來膜拜。然而轉眼間，在第十五屆美國世界盃的會外賽中卻節節失利，最終兵敗約旦伊爾比得，將球迷的美夢打碎，也使中國大陸足球界明白，洋教練並不然能使中國足球一下子有質的飛躍。痛定思痛，中國足協決定開始實行體制改革，向俱樂部與職業聯賽邁進，相信商業化才是足球根本的提升之道。同時也因為改革開放使大陸經濟起飛，為足球市場化、職業化，籌募資金舉辦全國職業聯賽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中國足協將甲 A 聯賽經營辦法推向市場，獲得了良好效果。1994 年，中國大陸首屆職業

足球聯賽——萬寶路足球聯賽揭幕，共有 12 支球隊參加 22 輪的角逐。最後，冠、亞、季軍分別為大連萬達隊、廣州太陽神隊和上海申花隊。賽後，中國足協將所獲資金的 80%撥給了參加聯賽的俱樂部和協會，以增強作為市場主體的俱樂部生存空間，盡力促使中國大陸足球真正走向市場。這項措施同時也明確了俱樂部的比賽經營權利，使其力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體制，逐步走上職業化。

伴隨著職業聯賽，中國大陸興起了一股商業性質足球比賽熱潮，許多公司紛紛以巨資邀外國俱樂部名隊來華作訪問比賽。繼施拉普納之後成為國家隊總教練的戚務生上任後，大陸隊在北京以 4：2 戰勝了來訪的義大利勁旅桑多利亞職業隊，北京國安隊則戰勝了世界足壇中有王中王之稱的義大利 A C 米蘭隊，掀起了中國大陸足球的又一次高潮。而且頻繁的比賽交流對於中國大陸足球引進世界先進技術，提高自身的足球運動水準起了正面助益。

中國對足球成績的執著，除了將運動職業化之外，也可以從更換國家代表隊教練一事看出端倪。1993 年施拉普納令大陸失望，於是 1994 年，戚務生接過中國隊的帥印，獲得第十二屆亞運會足球賽銀牌。但是在接下來的四年中，由戚務生帶領的國家代表隊先後在奧運會外賽、亞洲杯和世界盃會外賽三次空前慘敗。特別是中國大陸隊在 1998 年世界盃預選賽上的再度失利，震撼了中國大陸足壇。接二連三的失敗使引進洋教練的呼聲再一次高漲。為了早日實現擠身世界足壇的夢想，中國足協聘請了英國人鮑比·霍頓(bobby·Hordon)擔任總教練，一時間的確令中國大陸球迷為之一振：率領國家隊在東亞四強賽中 2：0 戰勝了日本隊。1998 年年底，霍頓同時接手了奧運隊，並率隊在當年

的曼谷亞運會中奪得了一枚銅牌。次年，奧運會足球會外賽上，奧運隊在霍頓的帶領下，在小組賽中以全勝的戰績進軍九強。然而在 2000 年雪梨奧運會會外賽中，奧運隊再次敗給韓國隊而無緣晉級會內賽，霍頓因此被解去總教練的職務。大陸足球總教練的這種戰敗即換、更迭頗速的命運，直到被稱為「神奇教練」的南斯拉夫人博拉·米盧蒂諾維奇在 2000 年正式接掌國家隊帥印，終於略顯轉機。中國足協的目的非常明確：進軍 2002 年世界盃，並獲得 2002 年韓日世界盃會內賽入場券。米盧蒂諾維奇曾經三次率領哥斯大黎加隊、墨西哥隊和美國隊打進世界盃的會內賽，擁有豐富的調教弱隊的經驗，中國大陸足協看重的正是他這種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將希望寄託在這位神奇教練的身上。神奇之名也果然名不虛傳，大陸男足終於 2001 年 10 月 7 日第一次闖入世界盃的聖殿，儘管之後屢屢失利，但終究得償所願，獲得了歷史性的突破，也樹立一個的新里程碑。<sup>10</sup>

## 六、結 論

綜觀整個中國男子足球發展的歷史，在短短的半世紀中可以分成三個階段。首先是迅速起步期（1949~1960）：在中國建國的初期，中國政府就已經基於外交、政治考量，將足球列為建國初期第一批重點發展項目。這個時期因

<sup>10</sup> 關於中國男子足球發展，請參考俞繼英主編，〈新中國的足球運動〉、〈紅山口會議——吹響足球改革的號角〉、〈職業足球在中國〉，《奧林匹克足球》，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2001 年，頁 29-39。中國足球協會編，〈新中國的足球運動〉，《中國足球運動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3 年，頁 115-329。

為政府銳意求進，從培育、代訓、建制幾方面樹立了正確的體育政策，包括從 1950 年開始即發展基層足球，並挑選有潛力的青少年選手培訓。正巧此時同為共產國家的匈牙利足球令世界震撼，因此中國將年輕球員送到匈牙利受訓，學習當時最強悍的方法，當作培訓國手的手段。同時也開始著手培養國際級的教練，並且熱心在國內開創各項相關制度，早在 1956 年就建立了甲乙級升降以及聯賽制度，在 1960 年已經確立了甲級—乙級—青年—少年四級競賽；而且相較於當時中國較封閉的外交政策，在國際足球交流上卻煞費苦心，邀請了不少球隊前來表演、競賽。整個五零年代，中央與地方都透過各種努力，希望能儘速將足球帶到國際性水準，目標即鎖定在世界盃。所以這個階段可以說是迅速起步的階段，短短十年（1949~1960）就從零到戰勝俄、蒙、北韓、越南、匈牙利二軍等國球隊，雖然不是國際強隊，但也算是交出了第一張成績單。

然而足球本身的發展背後，有外交與內政因素存在，因此其受到政策的影響格外明顯。第二個階段是嚴重中挫期（1961~1976），這是長達十五年的傷害期，外交上兩岸繼續角力，在國際會籍問題上互不相讓，中國於此時落敗，憤而退出國際足總，使得熱絡的國際足球交流大幅縮水。內政上，1958~1961 三年大躍進造成的飢荒，已經斷傷許多足球幼苗，足球與整個大陸都共同承擔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嚴重後果，一直要到至少 1963 年才稍稍復甦，卻禍不單行，在 1966~1976 年之間捲起千堆雪的文革，以驚濤駭浪的力量，不僅對傳統文化造成不可抹滅的傷害，也對尚待發展的足球運動造成不可逆的負面下拉，熱心提倡足球的政壇人士被清算鬥爭、應該在綠蔭場受訓

的球員成了紅衛兵、體育行政工作全面停擺、設施理所當然的被破壞、體育報刊被迫停止報同解散，更遑論參加國際性足球比賽了。之前所有的努力，在文革銳不可擋的破壞下，幾乎毀於一旦。這份傷害也使得中國足球發展虛擲了至少十年，倘若加上原十年中應有的進展，還有對原有根基的斷傷，說是至少有廿年的損失也不為過。這段期間的重挫，還需要更多時間、更強而有力的方式去彌補落差。

文化大革命終於在狂人毛澤東死後終結。1976年之後政治局面逐漸穩定，各種被破壞的項目開始重建，足球也開始展開修復動作，重回基層把因為文革青黃不接的窘境，從頭培訓起。所以從1977年開始，是中國足球發展迄今的第三階段：重新開始，往職業化邁進。七零年代中國外交政策轉彎，開始與非共產國家往來，甚至取得聯合國席次；連帶使得足球的國際交流頻繁，有助於擴展視野、提振技術。1981年鄧小平主政，改革開放的政策使得大陸經濟終於起飛，人民生活有了普遍、明顯的改善，更體會到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威力，打從1985年開始，中國中央就認為想要將中國足球再提升，一定要藉助這股商業化的力量，所以政策制訂就已經朝協會制以及俱樂部方向發展。而且到80年代後期經濟體質改善，連民間也開始邀請國外球隊訪華進行友誼賽或表演賽，企業從不吝於贊助這類活動。逐漸加溫的經濟活動，讓俱樂部制度也越來越迫在眉梢，尤其在中國足球國家代表隊始終無法進入世界盃的壓力下，土、洋教練更換也似

導，學生完全沈浸在革命的熱潮當中，當然沒有人會去體育學院讀書，於是各省市代表隊形乎無濟於事時，資本主義這帖萬靈丹成為中國球迷與政府的救贖，首先政府規定若干足球重點地區，必須在1993年底之前發展出俱樂部型態的足球隊；再者，1994年職業聯賽開始舉行。整個足球的職業化，也確實提高了中國足球的水準，讓中國終於在2001年進入世界盃聖殿中，初步達到半世紀前設定的目標。而且迄今為止，中國大陸甲A、甲B俱樂部球隊已經積累了近10年職業聯賽營運的經驗，與國際間職業聯賽日益相同。聯賽的舉辦，鍛煉了球隊，提高了足球比賽的水準。在為俱樂部、為球員帶來商業經濟利益的同時，也造成了一定的社會影響，成為人們生活中一個不可缺的組成部分，帶來了社會效益。

足球做為全球觀看人口最多的比賽，可謂動見觀瞻。中國在半個世紀中，歷經了迅速起步、嚴重中挫，再往職業化邁進，到21世紀的今天，兩岸在足球上的成績早已是高下立見。也許台灣與中國在政治體質上不同，造成中國的體育活動與政治相關，台灣的體育活動與商業密切，但是當共產國家的中國，都發現資本主義化才是根本的提振之道，台灣在足球這一塊卻相當弱勢，似乎疲軟得欲振乏力。不論台灣相較大陸是否地小人少、資源不足等等先天的弱勢，在後天努力上，政府與民間的關注與投入，才是成敗的關鍵。

